

市场

道德基础

经济

汪丁丁 著

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丁丁 著

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 汪丁丁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411-3

I. 市... II. 汪... III. 市场经济-关系-伦理学-中国-文集 IV. 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994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志毅



世纪文景

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汪丁丁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 页 1

字 数 167,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411-3/F · 1457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市场与社会的病理学（自序） / 1
世纪之交，义利之辨 / 4
中国 90 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 24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 34
再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 50
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 / 70
——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
在中国语境里读斯密 / 93
——为《情感、秩序、美德》序
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 / 104
——第三种文化的视角
知识社会与现代教育的双重困境 / 118
医生、医院、医疗体制改革 / 131
探索法治中国的法与经济学 / 155
制度分析的特征与方法论基础 / 162
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 / 183

市场与社会的病理学（自序）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或多种、适用于中国的、关于市场与社会的病理学分析。作为这一病理分析的粗浅的准备工作，这里收录了过去十几年里我发表的论述市场经济及其道德基础的文章。这些文章散在各刊物和文集当中，致使许多学生欲研读而无从查找。在友人催促下，现在结集出版，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入门读本。

借助于马克思和韦伯为西方社会及其市场提供的病理学分析，我们知道，“市场”是这样一种协调分工的制度，第一，它保护并激发一群理性个体谋求私利的动机；第二，在利己欲望的鼓动下，这些理性的个体参与收集、理解、传播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息；第三，如果有合适的支撑系统，上述过程就不断趋向于那些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状态；但是，第四，伴随上述过程的，是群体之内每一个体的利己欲望和私人资本的积累过程。后者导致日益扩展的利益冲突并倾向于瓦解群体之内的协调秩序；所以，第五，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不断修补这一嵌入在社会里的协调分工的秩序。能够容纳这一修补过程的“社会—市场”秩序，被称为“宪法”。

理解一个“社会”的比较方便的视角，是从个体出发，而不是从群体出发，把一群个体的每一个都看做是网络内的一个节点。每一个体（节点）与其他任一个体（节点）之间，存在许多“纽带”（边），经济的、政治的、情感的、思想的、

血缘的、地域的、语言的、文化的……并且每一条纽带对不同节点而言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权重）。这种所谓的“社会网络”视角，从1980年代开始融入社会理论的主流，最近更被引入到经济分析中，在诸如《博弈与经济行为》、《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和《经济理论杂志》这样的主流刊物上占了一席之地。

显然，任两社会成员的多重纽带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典型如因血缘纽带而得到强化的经济纽带，或因文化纽带而得到强化的政治纽带。也可以发生相反的情形，例如因经济纽带导致的利益冲突而弱化的情感纽带，或被政治冲突弱化的经济纽带。

所谓市场与社会的病理学分析，就是在例如上述的社会网络视角下，对社会成员之间各类关系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不理想状态的原因的分析。

于是，对社会现状的病理学分析的前提之一，是存在某些“理想状态”，又可称为“乌托邦”。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社会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乌托邦”。对韦伯而言，与各类现状构成对立的各类“理想型”，是社会分析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概括了许多社会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的，是一种被称为“美好生活”的社会状态。它由三个维度刻画，其一是“个体禀赋的充分发展”，其二是“正义”，其三是“足够丰富的情感生活”。

如果因社会现状偏离美好生活而引发的任一社会成员不幸福感足够强烈，则可进一步引发该社会成员的病态行为。在个体而言，这类病态往往被纳入心理分析的范畴。在整体而言，这类病态可以被纳入社会分析的范畴。后者，就被称为“社会病理学”。

由一群个体参与的“市场”，在社会网络视角下，被看作是“节点”的集合与其自身的笛卡尔乘积的一个子集，并且这一子集内的任一对节点之间的纽带，仅代表它们在市场里结成的关系——通常由一组契约条款刻画。

节点之间契约条款的执行，有三种监督方式，分别被称为“第一方监督”、“第二方监督”和“第三方监督”。除了第二方监督的一些情形之外，其余的监督方

式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市场以外的社会条件。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任何市场都是嵌入在某一特定社会内的市场。换句话说，在市场网络里任两节点之间的纽带，应被视为该市场所在的特定社会网络的相应两节点之间的多重纽带之一，它与其他纽带相互作用，决定了它自身的强度和效用。

与现实社会里的市场相对立的，是市场的理想状态，通常称为“帕累托最优”。当现实的市场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而造成足够巨大的效率损失时，它就表现出一种病态。对市场病态的原因的分析，是经济分析的重要职能之一，尽管这种分析往往超出经济学范围，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与文化等各门学科。也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一分析称为“市场病理学”分析。

一个健康的市场，总必须有能够支撑它的道德基础。今天，或许由于过去10年内目睹了普遍的道德沦丧和足以导致经济崩溃的欺诈行为，我们对这一点有格外深切的感受。从而，这本书也找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推测，任何一位认真的读者将立即注意到，本书所出现的许多语汇，在书中找不到相应的界说和阐释。这是因为，理论体系必须通过某一核心观念展开它自身。这本书的主题是“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通过这一主题，展开了许多其他语汇的界说和阐释，但它们却不能被完整地包括在这本书里。愿意深入探讨这一主题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已经发表的《制度分析基础讲义》I和II，以及即将发表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最后，我由衷感谢最初建议出版并编辑本书的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赵婕女士，为完成此项工作，她不仅阅读了收录在这里的文章，而且阅读了我以前发表的数十种作品。后来，由于无法预料的变故，这本书被移交给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也因此，我由衷感谢这本书的另一位编辑王志毅先生，他以严谨的风格，成为以往我在这家出版社的多种著作的编辑。我还要借此机会向陈昕和施宏俊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卓有成效地领导着世纪出版集团和世纪文景公司，并长期支持着我的著述工作。

世纪之交，义利之辨。

中国社会经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顺世界潮流，跌宕起伏，蜿蜒曲折，历经百年，目睹无数英雄豪杰，有称王称帝者，有立言立德者，有富可敌国者，有大隐于市者，有天降大任于斯者，有举案齐眉意难平者，沸沸扬扬，群情激荡，毕竟风流云散。世纪之交，大江东去，天道如常。

于世纪之交，兴义利之辨，《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无非是承接着百年市场生活与市民社会之流风，针砭时弊，奉持公义，披露实情，敬新闻本业之精神而已。试问天下通情达理之士，哪里有只许权贵勾结尽饱私囊而不许百姓呼喊以求昭彰于世的“市场经济”？哪里有只问金钱利益而置精神价值道德传统于不顾的“社会发展”？可叹区区“基金黑幕”，竟引发千夫侧目，百尺硝烟。大道未隐，方术已欲裂天下矣。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往今来，无数改革毁于假“改革”之名而萦萦于私利者，无数社会迷失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魄

力。《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正因此而吸附着泥土和大地，因此而获得了问天的勇气：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一、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当作首要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社会自 19 世纪以来始终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型期内，这一长期过程的主导关系始终是“西力东渐”大格局之内“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异己”之间的双重紧张关系。

就“传统”而言，延续数千年的宗法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不论我们称之为“乡土中国”、“超稳定结构”，还是“内卷生产方式”，其传统力量不可谓不强大。就“现代”而言，西方理性精神自希腊罗马之后，沉潜千年，发轫于近代资本主义竞争制度，终以科学与民主滥觞世界，其民族国家之坚船利炮，其市场社会之物质文化繁荣，亦不可谓不强大。于是在“传统”与“现代”这两个如此强大的力量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便不能不是基本的、首要的、长期的。再就“民族”与“异己”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而言，越是地域广袤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文化认同感就越强烈，其抵抗异己文化的心态就越普遍。西洋如此，东洋如此，中国更加如此。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鼓吹“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我们批判西方的以及我们自己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们维护对话伦理和交往理性，我们不同意但尊重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我们看来，只要上述双重紧张关系仍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仍会存在下去，并作为对西方霸权的一种反叛力量而获得道德合法性。

可以预期，在未来的 100 年里，“西力东渐”大格局之内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异己”之间的双重紧张关系仍将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发展的主导关系。多年以来，我们关于转型期各种具体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无不是以这一基本格局为大背景的。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表现出了那一发展阶段独有的特征,这一特征可由下列三项陈述的合取式刻画:(1)从一个不彻底的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向着一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形态过渡;(2)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3)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分崩离析,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远未确立。

上列陈述的第(1)项说的是我们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彻底性”,由此引出的种种深层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浮出水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次,陈述(2)意味着,如韩国学者曾经概括的那样,“高速增长是最好的药方”,在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冲突和经济隐忧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陈述(3)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价值真空”状态,对于社会之为“社会”而言,这是一种混沌状态,从这里可以生成新的秩序,也可以瓦解为彻底的无序。

从1980年到2000年,20年时光,对于我们所说的几百年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期来说,无异于“弹指一挥间”。然而一切制度都是通过特定的一代或几代人来复制自身的,人又是通过特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判断来理解和评价制度的。路径依赖,从量变到质变,短期的边际波动贯穿起来造就了长期趋势和整体形态的转变。在这20年里面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必将对未来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我们甚至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今天,当我们开始体验21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试图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加以刻画。事实上,在关于转型期社会的思考中,对眼下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刻画,如前述,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因为这一特征在时间维度上是不断过渡着的,是不稳定的,从而容易被次要因素和个人情感所遮蔽。

由于上述1980-2000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不断发展,还由于上述的整个转型期内“现代与传统、民族与异己”双重紧张关系的深化,当前中国社

会经济的基本特征，按照我们的理解，可以由下列三项陈述的合取式刻画：

1.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和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转型而言严重滞后，导致了下列发展和改革的深层问题：(1) 创新者利润权利的宪法保护问题。这里“创新者”即指规范语言所说的“企业家才能”，而“利润”则指由创新带来的“价值剩余”，保护利润权利的“宪法”指的是这一语词本原意义上的、作为特定社会政治秩序的构成原理的“宪法”，只有当文字形式的“宪法”符合这一构成原理时，文字宪法才具有合法性；(2) 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问题。这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的原理完全没有过时，只要中国无法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就永远是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最基本的紧张关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劳动对资本占据了强势地位的时期不过30年，而在其余的70年里，市场经济的“轴心关系”始终是“资本压迫劳动”；(3) 与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并且起了主导作用的，是我们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一基础的道德根据，对彻底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叫做“剥夺‘剥夺者’”，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来维持剥夺者的被剥夺局面，这一要求本身已经放弃了对政府在其他方面合法性的道德根据的确认。另一方面，对彻底的成熟市场社会而言，普选和代议制的民主政体、权力制衡与互相监督、竞争性的新闻自由和对全体纳税人的信息披露，这三大原理构成政府合法性的惟一道德根据。正是在这两个稳态社会的政府合法性基础的反衬之下，才显出我们政府的极端尴尬的处境：这个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它是要保护“资本”，还是要保护“劳动”，还是从阶级压迫的工具外化为社会冲突的仲裁者，或是扮演公司“中国”的执行总裁，抑或是单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不论如何，它无法回避这样两个迫在眉睫的选择：(a) 政治科学以及政治传统都告诉我们“名正言顺”的重要性，“正名”而后可以“行事”。我们的政府必须选择一个“名分”。(b) 如亚里士多德早就论

述过的，事物的目的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政府的职能决定了它生命的限度。我们的政府必须选择自己的职能。

2. 世界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衰退甚至萧条的阶段，从而“后冷战”时代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秩序正逐渐被各国瓜分世界市场的经济利益冲突和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各弱势民族与西方强势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所取代。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结束长达 20 年的高速增长期（韩国和日本相应阶段的期限都在 15 年左右），转入一个低速的从而也是正常的增长阶段，并且很可能随世界经济一起陷入衰退。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各种社会矛盾便格外尖锐地凸现出来，蛋糕小了，贫困威胁增加了，人际关系也就开始紧张。更何况，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过诸如普遍腐败、权力制衡、劳资关系、舆论监督等等重大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那么，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谁敢断言这些深层问题不会以更加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呢？就经济结构而言，当增长速度下降时，投资方向和技术进步的方向都会相应有所调整，企业产品结构和整个产业结构也会有所“升级”（即从边际利润低的产品和产业转向边际利润高的产品和产业），通过升级，企业利润和要素回报增加，从而人均生活水平得以维持。但是经济结构的“升级”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结果，当我们缺乏足以激励和保护创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时，我们怎么指望经济结构的升级呢？最后，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人口老化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如我们反复强调过的，中国人口将于 2020 年左右达到老龄化的高峰。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只有一代人的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从而确保老龄化人口的劳动生产率足以维持整个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这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发展阶段将是一个艰难和沉重得多的任务。更何况我们还没有确立行之有效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找到合理而有效的人才教育体制。

3. 市场导向的行为模式和“金钱话事”的评价标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取向发生了严重冲突，激发出包括

“政治波普”和“格瓦拉”在内的各种社会反叛行为，强化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亚洲价值”的流行，并且集中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卷入的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与文化前途的论战。如果说，1980—2000年期间是传统价值体系瓦解的阶段，那么未来的20年很可能将是价值完全失落的阶段。另一方面，经济合作、创新行为、大规模投资，正日益变得复杂化、网络化和敏感化，很难想像在一个价值失落因而行为高度短期化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和信任程度能够支撑大范围的交易与稳定的行为预期。

上列三个方面的状况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将决定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特殊历史进程，推而广之，这一特征将决定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内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历史特殊性或“基调”。

二、资本市场与市场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

如上述，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以及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特定历史过程中的制度；中国资本市场的基调是“中国”，不是美国或德国。另一方面，理性又总是试图从各个特定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普遍的一般关系。这是一种后验（而非先验）综合的一般关系，因此它所刻画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不具有“必然性”。

在应用经济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应用过程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概念误解，那就是把统计性的联系与因果性的联系混淆起来指导现实问题的判断和推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讨论资本市场与市场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之前澄清这一认识论混淆。

从事件A与事件B之间的统计相关性中，科学不能作出任何因果推理。反之，当我们在事件A与事件B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在运用“理性”为“自然”立法，是在依赖先验的逻辑的纯粹理性能力从一套先验公理体系出发

推演出事件 A 与 B 之间的现象关系，至于这关系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统计检验的支持，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件事情（修正假设和公理体系绝不意味着逻辑推理不是先验必然的）。中外媒体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统计联系报道为因果联系。例如某医学统计发现适度饮酒的心脏病患者比完全不饮酒和酗酒的心脏病患者有更长的存活期，结果在 CNBC 报道中被说成“适度饮酒可以延长心脏病患者的寿命”。同样，根据西方某国的成功经验就把一套制度搬进中国社会里，希望收到类似的效果，这是犯了把统计关系当做因果关系的认识论错误。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专家学者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常常会以另一种方式犯同样的认识论错误，那就是完全放弃主观努力，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统计规律发生作用上面。例如，眼下许多朋友认为，只要有了市场机制（姑且不论这种孤立的“市场机制”是否存在），就可以不关心道德基础和意识形态，一切都会自动好起来的。从统计关联角度看，成熟市场社会一方面实行着市场制度，另一方面物质文化生活繁荣。但这仅仅是统计关联，它完全不能取代那些成熟市场社会内部每时每刻进行着的维护自由与公义的努力，以及同样时刻在进行着的营私舞弊、弱肉强食的努力，“天使和撒旦在每个人心里”。战后，特别是 1960—1980 年期间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同样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宪法的、文化的、个体意义的），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动荡与经济萧条。

牛顿力学是因果关系，欧氏几何学是因果关系，数理逻辑是因果关系，而所有这些因果关系体系的初始假设与公理体系都不能从因果关系中得到证明（从而才成为初始假设）。此外还有大量不像自然科学和数学那么显著的因果关系体系，例如社会科学体系，例如行动者与其行动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关于个人的思想与努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各种因果关系假设（“英雄史观”？“奴隶史观”？“宿命论”？……）。由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天性的取向几乎总是干脆放弃“因果假设”的选择，随波逐流，“免费搭车”。

与我们讨论的资本市场问题密切相关的“一般关系”是：1. 发展与泡沫的关系；2. 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3. 发展与价值体系演变的关系。这里说的一

般关系是统计性的联系，社会科学完全不指望自己能够为如此复杂的联系建立因果关系模型。我们之所以把“发展”当做这三个一般关系的核心，是因为如文章开始所论，中国社会经济在长期内的特征之一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非“成熟”。

“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被叫做“泡沫”的现象，著名者如荷兰的“郁金香热”。“泡沫”发生的一般机制是这样的：首先，人们——掌握着资源控制权的人们，对某个过程的不断进步产生了兴趣，对“不断进步”本身有了信心和期望，从这信心和期望里又进一步产生对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进步幅度的预期。这样，投资回报的理性推理便开始发生作用，开始支持事后看来极其不理性的投资行为。通过学习股票市场的历史，我们意识到这样几件事实：（1）一切“泡沫”都是事后才被确认为泡沫的；（2）关于“泡沫”的信息正是通过制造泡沫才引起人们注意的；（3）市场，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所论，应当被叫做“市场过程”。私人信息在市场过程里转化为公开信息，而泡沫是这一转化的伴生物；（4）制造了泡沫的人可以借信息在人群中分布的不对称性而获取“非正常利润”，对市场而言，这就是所谓“信息成本”，正如经济周期对社会而言是“市场成本”一样。

所以，“泡沫”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招引注意力，因为注意力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第一个前提，还因为弱小的新生事物往往只能用制造泡沫的方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个新生企业或项目的扩张过程：（1）新产品受到客户欢迎，开始从老产品那里夺取市场份额；（2）新产品的投资回报开始超过老产品，在公司季度业绩报告里受到重视；（3）公司季度报告和新闻发表会开始对新产品未来市场扩展的幅度提出预测，在公司资金不足时，融资和投资基金开始注意、跟踪和研究这一新产品的技术和市场潜力；（4）融资和承销商对特定客户群发表新闻和研究报告，解释投资决策，论证融资的合理性。注意，到了这一步以后，由于享有悠久信誉的投资机构的研究报告从特定客户群流传到公众社会并往往引发新闻媒体的报道，这整个过程才开始向着非理性的“泡沫”转化。如果“偏离真理一步就是谬误”，那么当研究报告挟着大型投资机构的名声在公众社会

流传时，恐怕它偏离真理已不止是一步了。

早期的“泡沫”大体上是凭借“口传口”在市场和公众社会里传播信息的。而现代社会，如吉登斯所言，在“空间”上，一方面是极度扩展，把整个地球变为“村庄”；另一方面则极度侵入私人领域，把每个人的每个生活角落囊括到公众空间里去。与此同时，在“时间”上，现代社会日益变得敏感化，信息流动速率越来越高，越来越便宜。现在对每个人来说，惟一重要的信息成本是“注意力”的机会成本。这样，在前述“泡沫”的一般性质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指出，“泡沫”在现代社会里的特征是：对特定的公众社会，存在一个明确的注意力“阈值”（注意力受到吸引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一旦超过这一阈值，关于“泡沫”的信息就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从而使它转化为真正的泡沫。但是当注意力还没有达到这一阈值的时候，公众将对“它”表现出现代社会特有的冷漠和蔑视，只因为它不是“明星”。由于“泡沫”的这一现代特征，“泡沫”的制造者们不得不以百倍的努力去制造“泡沫”，并且一旦成功就以千倍的仇恨对公众加以报复。

对“互联网”这一现象，我们已经写了大量文章为之鼓吹为之澄清，这里不能一一复述。我们的结论是，只要在这一行业从事创新的企业家可以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它就将证明自己不是“泡沫”。如上所述，一切“泡沫”都是事后确认的，现在人们争论互联网是否为“泡沫”，在论题上已经不妥当。因为，首先，互联网作为技术显然不是“泡沫”，它已经存在30多年了。其次，我们只可以讨论特定的互联网公司，就其特定商业模式而言是否成为“泡沫”，例如目前比较公认的互联网“泡沫”是“Priceline.com”，它的商业模式已经被它的商业实践否定了。最后，当我们讨论特定企业的特定商业模式是否为“泡沫”时，我们其实是在评价和质询那个企业家的业绩和企业家能力。他能成功吗？他还能转败为胜吗？他还能找到另一个商业模式吗？他还能熬得过这次萧条吗？等等，等等。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投资是与这位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联系着的，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认为“它”不是“泡沫”，因为“他”不是“泡沫”。

这里要讨论的第二个“一般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社

会结构”是个庞大的概念，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团、企业，几乎无所不包，抽象出来，一个人群内部全部人际关系当中相对稳定的那些关系所构成的“网”就叫做社会结构，这张网的每一个节点就代表一个人，而我们关心的社会结构的各种性质就都可以表现为这些节点之间网线的特征（参数）。例如，就眼下的问题，我们最关心的是资本市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这一作用而言，一个关键性的参数是“权力”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深知，在 Edgeworth Box（埃奇沃斯方盒）里，权力的分布状况对交换的自愿程度与公平至关重要。那些不自愿的交换，我们称之为“超经济剥削”；那些只改善交换中一方福利的交换，我们称之为“垄断”；只有那些为交换双方带来的福利超过了交易费用的交换，我们才称之为“自由交换”，并把全体自由交换的集合命名为“自由市场”。

社会为什么要存在？这是一切社会科学都要面对的所谓“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制度经济学的回答是：因为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协调分工的成本，所以有社会存在。这是一般性的回答，当我们把这个一般原理运用到具体社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辨认：（1）制度问题的技术经济性质，什么样的分工？分工要求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2）制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性质，谁获得什么样的以及多少好处？分配方式是怎样的？谁支付什么样的以及多少代价？支付方式是怎样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3）制度问题的经济学性质，在（1）和（2）安排下的分工及其收益成本分配关系，是否在帕累托改善的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为每个社会成员带来了超过其支付成本的好处？在（1）和（2）怎样的重新安排下，这些好处可以进一步提高（或者降低）？

作为制度经济学家，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权力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越是不平衡，通过市场交换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博弈的效率就越是受到权力结构的扭曲，这叫做“权力”的“寻租”现象。

一般说来，成熟市场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下列三个相互依赖的特征：（1）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从外部观察，我们会有“叠床架屋”之感，可是从内部观察，我们